

書 評

林 小 涵*

Suyoung Son 孫修暎

Writing for Print: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

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18, xiii+249 pages.

ISBN 9780674983830

學術界近二十年來對中國書籍、出版文化的討論，已由早期關注技術史、文獻史，¹ 轉向著重文化研究視角之書籍史、出版史、印刷史等面向。² 在此學術風潮發展過程中，學者亦不斷地對既有研究方法進行

2018年12月3日收稿，2019年6月5日修訂完成，2020年1月14日通過刊登。

* 作者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Lin Hsiao-han, Ph.D.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.

- 1 大木康曾指出早期書籍、出版文化的技術史傾向，詳(日)大木康，《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》(東京：研文出版，2004)，頁4-6；趙益則由中、西學術系統討論此議題研究取向之演變，趙益，〈從文獻史、書籍史到文化史〉，《南京大學學報(哲學、人文科學、社會科學)》3(2013.9): 110-121。
- 2 近年研究成果的回顧詳：Robert E. Hegel, *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8), pp. 3-13; Kai-wing Chow, *Publishing, Culture,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4), pp. 1-18; (日)高津孝，〈米国の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〉，《中国：社会と文化》

反思。³ 作者孫修暎 (Suyoung Son) 現為美國康乃爾大學亞洲研究學系 (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, Cornell University) 助理教授。在本書中，作者汲取書籍史、文學批評理論，以考察文獻目錄、細讀文本等方式，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，⁴ 增加對出版、聲譽與收益之互動關係，及文字審查制度如何影響叢書編輯、流傳和接受二大面向之討論。透過對十七世紀張潮 (1650-?)、王暉 (1636-1715) 兩位文人出版家的圖書事業的重構，思考在手稿與雕版印刷傳統中，同朋贊助與聲名間的關係，及文本作為禮物或商品對其成書過程的影響。並以張、王兩人所編叢書為觀察面，探討上述出版實踐在十八世紀中、韓兩國的出版審查運動中衍生的效應。全書主要論點如下：首先，作者以張潮及王暉相關尺牘，補充出版史研究中，長期面目模糊的書籍出版實踐；其次，深入考察張潮與王暉兩人創作、交遊及出版事業間互動關係；再次，提出張潮編刊之《虞初新志》、《檀几叢書》、《昭代叢書》在朝鮮王朝正祖時期 (r. 1776-1800) 流傳樣態的新資料。

本書依歷史框架分為「十七世紀作者的出版實踐」與「十八世紀的

20(2005.6): 471-481；陳俊啟，〈另一種敘事，另一種現實的呈現——新文化史中的「書的歷史」〉，《中外文學》34.4(2005.9): 143-170；Joseph P. McDermott, *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: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* (Hong Kong: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, 2006), pp. 263-278, in particular see “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Studies Useful for the Writing of This Book”；涂豐恩，〈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〉，《新史學》20.1(2009.3): 181-215；Yuming He, *Home and the World: Editing the “Glorious Ming” in Woodblock-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* (Cambridge, MA: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13), pp. 7-8.

3 Cynthia J. Brokaw, eds., “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,” in Cynthia J. Brokaw and Kai-wing Chow, eds., *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5), pp. 3-54；(美) 芮哲非 (Christopher A. Reed)，〈印刷與出版史能為中國學研究作些什麼？〉，收入王榮華主編，《多元視野下的中國——首屆世界中國學論壇》(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6)，頁61-72；秦曼儀，〈兩位書籍史家的方法論反省與實踐——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、閱讀和書寫文化史的研究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41(2008.6): 257-314；李仁淵，〈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——實踐、過程、效應〉，收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，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，《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)，頁213-254。

4 Suyoung Son, “Writing for Print: Zhang Chao and Literati-publishing in Seventeenth-Century China,” (Ph.D. diss.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, 2010).

跨區影響」兩部分，第一部分共分三章，討論十七世紀作者的出版實踐。作者在第一章試圖重建張潮與王昶編刊書籍及其傳播、接受過程，著眼於印本、寫本的重疊處，回應在傳統書籍史討論中印本常被視為最終、固定不變結果之問題。首先由張潮及其所屬文學社群展開討論，描繪出以張氏家族為中心，涉及徽州、揚州、杭州三地文人同朋群體的交遊網絡。並以張潮編刊與諸友往來之書信集《尺牘偶存》、《尺牘友聲》三集為材料，按傳統雕版印刷程序，勾勒其書籍編刊過程。⁵ 最後指出張潮《幽夢影》正文和附加的評語組成雙重、非對稱文本結構，（頁44）並因《幽夢影》經歷數次加刻補印過程，提出「可塑的印本」之看法，（頁51）呼應作者所強調抄本與刻本間相似性的概念。⁶

第二章以王昶的出版活動，討論清初書籍出版、文人自我推銷與文人圈的交互作用。作者指出彙集晚明至清初與王昶往來三百餘位文人「嘉言懿行」之《今世說》，不僅是對「世說體」的仿效，更反映文士面對舉業競爭、政治變動及商業化對社會結構拆解時，將同朋間「雙向性」的「聲譽」視為確認自身社會、文化狀態的晴雨表之轉變。（頁72-73、76）並以王昶〈戒折花文〉、〈看花述異記〉的創作、刊行與改編，說明文名受認可之規模隨文學創作形式、對不同讀眾的出版規劃不斷擴大。第三章討論書籍刊印的經濟面，探討此時作者／編者期盼藉刊行著作獲得何種利益？分析金錢的經濟動態與聲名在張潮與王昶編刊的《檀几叢書》與《昭代叢書》中被分割的方法。（頁90）作者認為出版不僅是從無形象徵到有形財

5 (美) 魏愛蓮 (Ellen Widmer) 是以文人尺牘為材料，再現其交遊網絡，並重建與此相關的圖書事業、文學創作或評論閱讀活動之先趨，如氏著，〈*Hsi-yu Cheng-tao Shu in the Context of Wang Ch'i's Publishing Enterprise*〉，《漢學研究（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）》6.1(1988.6): 37-63。

6 作者在2007年11月3日舉辦於紐約新學院大學 (The New School) 之「明清文學年度工作坊」中宣讀「文人社群與刻本的製造」，以張潮編刊叢書及《幽夢影》在文學體式上之創新，提出對抄本及刻本明晰界線的質疑，見許暉林，〈「白話小說，書籍史與閱讀史——明清文學研究的新視角」研討會論文評述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18.3(2008.9): 11。本章除為作者博士論文之一章，亦曾修改發表為：Suyoung Son, "Publishing as a Coterie Enterprise: Zhang Chao and the Making of Printed Texts in Early Qing China," *Late Imperial China* 31.1(2010.6): 98-136.

物資產轉變的媒介，在取得聲譽過程中金錢的重要性不斷增加。而張、王兩人選集所呈現的菁英文人趣味，既是當時趨向多樣化、可區分的書籍市場中，成效卓著之營銷策略，亦啓發讀眾追求類似圈內人知識與資訊。（頁116、123）作者在第一部分的貢獻有二，首先關注雕版印刷的物質特性，突顯傳統書籍史研究者對「書」（book）定義的侷限。⁷藉重建作者／編者的出版實踐，揭示抄本與印本交疊處，體現文本的流動、可補充甚至重塑性，（頁42）以重新定義文本、作者和讀者間的關係。Peter Kornicki、賈晉珠（Lucille Chia）、魏希德（Hilde De Weerd）皆已著眼印本／抄本在書籍編輯過程中的連結，及兩者手工特徵與物質形態之共通性；抄本層積刊刻前各種修改痕跡，而雕版印刷手書上板等形式像是手稿的複製。⁸作者以此觀點分析張潮《幽夢影》創作到蒐集評語過程，挑戰書目、版本學對最終定本的強調，轉向關注讀者形塑下的印本多樣性。（頁51）然筆者認為作者在關注印本物質性時，偏向強調讀者的作用力，及產生此文本形態的文學歷史背景，⁹隱然將其視為中華帝國晚期之新變，忽略此面向的歷史源流。例如，南宋已可見文人（作者、編者）善用雕版印刷靈活性之例。村上哲見考證出陸游（1125-1210）《劍南詩稿》及其續集不僅收錄其自序，且在他生前梓行並修訂增補一次。¹⁰《幽夢影》特殊處在作者與

7 Roger Chartier, *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*, Lydia G. Cochrane trans.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87), p. 1.

8 Peter Kornicki, *The Book in Japan: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* (Boston: Brill, 1998), pp. 27-29; Lucille Chia, *Printing for Profit: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, Fujian (11th-17th Centuries)* (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03), pp. 11-12, 25-33, 42; Hilde De Weerd, "Continuities between Scribal and Print Publishing in Twelfth-Century Song China: The Case of Wang Mingqing's Serialized Notebooks," *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* 6.1(2016.1): 54-83.

9 合山究指出《幽夢影》評語，與明代以降盛行的文學評點傳統有關，且認為以張潮為中心談論小品的形式，極似明代談論小品的社集。並指出評語的對話特徵，與成書過程透過尺牘傳遞有關。（日）合山究，〈小品文学と張潮〉，《幽夢影》（東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77），頁41-42。

10 （日）村上哲見，〈陸游『劍南詩稿』の構成とその成立過程〉、〈ふたたび陸游『劍南詩稿』について—附『謂南文集』雜記〉，《中國文人論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4），

讀者的高度互動，張潮於創作、編刊時，將讀者（評者）安置在文本中，創造嶄新的閱讀感受。¹¹亦藉此文本的空白性、未定性，繼續召喚讀者參與討論、發言。

其次，作者突顯中華帝國晚期出版與文人聲譽、經濟間的互動關係，認為此介於家刻與商業出版間的模式，（頁96）得力於共享理念、文章價值和準則的文學社群。（頁87）筆者認為以出版業與文人身份、社群形態變化之關連為觀察點，可更清楚的說明上述模式。宋代已見許多科舉不第者，轉而從事醫生、占卜、風水、館師或幕友等知識相關職業，這些非士大夫的中間階層與坊刻業關係密切，他們或出版自著，或參與編輯工作，被視為「新一代知識人」。¹²晚明出版愈加商業化，許多士人在不同層面、領域參與商業出版，其中「山人」群體可視為此類兼具士／商身份文人的代表。他們充份運用自身象徵性資本，以提高所編刊書籍之銷量及其文學聲望。¹³王晫、張潮及其同朋，正是承繼並轉化上述風潮之新型態文化人。筆者認為將兩人置於此脈絡中思考，既有效整合作家／出版家身份，理解其交遊、文化活動、創作及出版事業間的關係；亦明晰作者所欲討論清初印刷文化新變所在。

本書的第二部分共分二章，作者在第四章藉探討《檀几叢書》與《昭

頁208-256。又如，南宋已見文人與民間書肆協同刊行作品集，以江湖詩人與出版家陳起的合作最具代表性。其中，劉克莊（1187-1269）《南岳稿》刊印過程受江湖詩禍（宋寶慶三年，1227）影響，曾對版木進行增刪，詳（日）內山精也著，朱剛、張洵、劉靜、益西拉姆譯，《廟堂與江湖——宋代詩學的空間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181-183、200-201。

11 楊玉成，〈小眾讀者——康熙時期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批評〉，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19(2001.9): 26-27。

12 （日）內山精也著，朱剛、張洵、劉靜、益西拉姆譯，《廟堂與江湖——宋代詩學的空間》，頁194-201、250-254。

13 （日）大木康，〈山人陳繼儒とその出版活動〉，明代史研究会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，《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0），頁1233-1252；Kai-wing Chow, *Publishing, Culture,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*, pp. 139-141; Jamie Greenbaum, *Chen Jiru (1558-1639): The Background to,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Uses of Literary Personae* (Boston: Brill, 2007), pp. 59-81.

代叢書》在十八世紀中國及朝鮮王朝文學查檢制度下的接受與傳播，說明書籍不僅在生成過程與文人群體、社會文化、經濟與政治互動密切。即使在刊印流傳後，這些變因亦能使書籍樣態隨之改變，並呼應第一部分中，作者強調印本並非完足整體及其多樣性之論點。第四章討論張潮《虞初新志》在清乾隆朝四庫全書編纂期間，在遭受排除、查禁後，修改部分內容後繼續刊行之事。作者從選集編輯與傳播的角度分析，著眼其中關乎群體、具延展性，和透過國家力量難以掌控之私人或商業管道流通諸點，（頁130）認為《虞初新志》遭禁之因，主要出於對私人出版繁盛的焦慮，而非單純以此壓抑反滿思想。第五章作者藉重建《檀几叢書》在十八世紀朝鮮王朝的輸入、閱讀與審查，由文化傳播的角度，指出正祖時期審查制度並非歷史學家所稱，是達成中央集權政治派系控制手段；亦不僅止於文學史家所認為對文化及理想主義之抑制，以文化保守主義防範受來自中國書籍啟發的多元觀點表達。（頁165）作者考量當時跨國書籍流通的繁榮，認為審查更偏向藉壟斷書籍輸入，恢復國家對思想、知識乃至於文人群體交流的控制權。

作者在第二部分的貢獻在於提出《虞初新志》在朝鮮王朝的翻譯，及其與《檀几叢書》、《昭代叢書》在正祖時期輸入與接受等新資料。觀察書籍的流通、閱讀等情形，透過書籍的社會史分析，完成有別於以往偏重文獻學面向的書籍傳播研究。¹⁴ 在東亞書籍史研究中，圖書的單向交流已廣受討論，張伯偉因而提出「書籍環流」概念，關注其傳播過程的多向循環，強調「東亞漢文化圈」交織著多重、複調的聲音。¹⁵ 以《虞初新志》為例，是書不僅流傳、譯介於朝鮮王朝，至晚於日本桃園天皇寶曆十二年（1762）已舶載入日，在翻刻為訓點本後廣受文人迴響，引發日本虞初體

14 李仁淵將西方閱讀史研究歸納為「作為行動的閱讀」、「讀者與讀物」、「閱讀、思想與社會」三大課題，最末項正強調由閱讀與接受的層次思考書籍與社會文化間的關係。李仁淵，〈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——實踐、過程、效應〉，頁213-254。

15 張伯偉，〈略說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〉，李爽學、胡曉真主編，《圖書、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》（臺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2015），頁203-231；張伯偉，〈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——以《清脾錄》為例〉，《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），頁85-123。

漢文小說選編風潮。¹⁶ 筆者認為由「書籍環流」視角觀察《虞初新志》在中國、日本、朝鮮的流傳，不僅跳脫固有一國之文學史框架，更展現《虞初新志》的豐富性及複雜性。如傳入日本的《虞初新志》刊本，不僅成為研究《虞初新志》諸版本間關係及內容演變的重要參考。亦使對東亞漢文學研究中，日本漢文小說對中國文學的容受，以及「域外漢文學」創作研究更深一層。《虞初新志》在傳入朝鮮並受到譯介後，經常作為論證之理據或查找掌故、名物之用，其文本性質在傳播—接受的過程中產生變化，亦應深入討論。¹⁷

總而言之，本書對照閱讀張潮、王暉出版物及相關尺牘等文獻，留意他們編撰書籍在中國的接受史，也將研究視角拓展至正祖時期的朝鮮。具體呈現清初出版實踐，並彰顯印本書在傳播到接受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改變，及其社會文化意義。不僅對中國書籍史研究有所助益，更提示關注「東亞」視角，對現有中國文學研究的積極作用。

16 (日)大庭脩，《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》(吹田：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，1967)，頁696、李進益，「明清小説對日本漢文小説影響之研究」(臺北：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士論文，1993.6)，頁216-235。

17 張潮所編3部文言小品叢書《虞初新志》、《檀几叢書》、《昭代叢書》，傳入朝鮮後的接受史均發生轉向類書的質變，以李圭景(1788-1856)《五洲衍文長箋散稿》35次引用為最，其它如李德懋(1741-1793)《青莊館全書》2次、成海應(1760-1839)《研經齋全集》1次、丁若鏞(1762-1836)《與猶堂全書》5次、韓致雍(1765-1814)編《海東繹史》1次、金允植(1835-1922)《雲養集》1次、黃粹《聞見別錄》1次。

